

景迈山

传承之光

世界了解中国茶文化的一扇窗口

核心阅读

经过 100 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中国西南及邻近地区是世界茶树植物的自然起源地。

景迈山保留延续了“林下茶”的传统种植方式，可以说是世界茶树种植的“活化石”。景迈山古茶林为全球留存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典型的早期茶林景观遗产。

景迈山传承的是中国云南特有的乔木型大叶种茶树制成的“普洱茶”。制茶是景迈山每位茶农的看家本领，是每个家庭世代传承的手艺。直至今日，景迈山茶农依然采用古法制茶。

中国作为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拥有众多著名历史茶园，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一些著名茶产地也被消费者如数家珍。今年 9 月 17 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座茶文化景观遗产。看似寂寂无闻的景迈山，何以脱颖而出？

将茶树发展成为可堪饮用的茶叶，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要义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认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先要了解它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条件。经过 100 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中国西南及邻近地区是世界茶树植物的自然起源地。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的景迈山就处在起源地的中心地带。

茶树的历史远比人类古老。在大约 300 万年前的第四冰川纪，全球气温下降，众多生物遭遇大规模灭绝。因横断山脉阻挡了北边的寒流，又有南边的海洋提供水汽，中国西南地区成为全球第三纪古老植物庇护所之一，茶树的祖先得以幸存。

数百万年以来，茶组植物进行着自然传播与演化，从中国西南到华南，经澜沧江、长江、西江等河流传播至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经多国学者的理论推演和调研实证，中国是栽培型茶树的原产地，今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源于中国南方的山茶科、山茶亚科、山茶族、山茶属、茶亚属、茶组植物物种及变种，以及它们之间杂交而成的品种。

中国人最早驯化栽培茶树的实物证据，是浙江余姚田螺山考古遗址出土的木材遗存。这些遗存为山茶属的同种树木，与栽培茶树的木材结构一致，而且诸多迹象表明这些树木系人为种植，表明 6000 多年前在浙江地区生活的先民已经人工栽培茶树。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茶叶残渣证明，生活在这里的西汉皇室已经形

成饮茶习惯。公元前 59 年王褒《僮约》记载的“煎茶茶具”“武阳买茶”，说明当时在四川，茶叶已是比较普遍的商品。由此可知，早至汉代，中国西南及长江流域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茶树种植，茶叶具有药用、饮用和祭祀等功能，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人最早发现茶树并将其驯化，通过制茶技艺和饮茶风俗将茶树发展成为可堪饮用的茶叶，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林下茶”种植方式及其森林生态系统，直观体现了中国茶文化观念

与中国诸多历史悠久的茶产区相比，景迈山有何特殊？

晚唐樊绰《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是最早明确记录云南产茶历史的文献，说明云南不晚于 9 世纪已有茶树种植、茶叶制作和饮用。银生城当时的管辖范围包括哀牢山和澜沧江中下游地区，景迈山就在其中。

茶树成为一种经济作物，人工栽培形成大规模茶林或茶园，与茶产区茶农定居开发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景迈山不仅种茶历史悠久，尤为可贵的是种植茶树的族群没有改变。傣族、布朗族部落定居景迈山，在此繁衍生息历千年光阴，逐步形成芒景 5 个布朗族村寨和景迈 4 个傣族村寨，共约 5000 人。这 9 个村寨被 5 片古茶林所围绕，5 片古茶林又被 3 片分隔防护林隔开，形成“山共林、林生茶、茶绕村”的景观格局。

茶树是从森林走出来的植物，其天性决定了森林是它最适应的生长环境。而中国人在此过程中，认识茶树特性，对其进行选育培育，形成了从乔木一半乔木一灌木的性状演化，也形成了不同的茶园管理方式和不同特征的茶文化景观。景迈山最为难得的是保留延续了“林下茶”的传统种植方式，可以说是世界茶树种植的“活化石”。景迈山古茶林为全球留存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典型的早期茶林景观遗产。

根据布朗族口述历史，他们在迁徙途中发现野生茶树，无意中嚼茶叶，却医治了染疫病的族人，遂决定在此定居，逐步建寨、开辟茶林。先民采集茶籽种植在森林，逐渐形成了景迈大叶种这一本地群体种，即由当地原生茶树自然繁育形成的混合品种。

为保证茶树的生长空间，先民选择性地砍伐觊觎茶树生存空间的植物，保留有益于茶树生长的高大乔木，以提供茶树喜爱的漫射光，

邹怡情



茶树得以在灌木层形成优势群落。而草本层与枯枝落叶一起滋养着土壤，提供茶树生长所需的天然养分，林间的昆虫和鸟儿则保护茶树免受病虫害侵蚀。秋天茶籽成熟时，茶农种下新的茶籽，形成了小树、大树和古树共同生长、有机更新的古茶林。

景迈山“林下茶”传统种植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森林生态系统，不仅为茶树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也成为孕育生物多样性的天堂。陆羽《茶经》对茶树种植环境的评价是“野者上，园者次”，而景迈山的“林下茶”种植方式无疑为“野者上”。漫步在景迈山古茶林，可以嗅到浓郁的森林气息，混合着泥土、草木的芳香。自然的菁华都被茶树吸收，成就了景迈山茶的独特风味。

茶，“人在草木间”，汉语的造字法传神地阐明了中国人对茶的理解。景迈山茶农所采用延续的“林下茶”种植方式及其森林生态系统，直观体现了中国茶文化观念。

茶叶贸易促进景迈山茶产业发展

景迈山传承的是中国云南特有的乔木型大叶种茶树制成的“普洱茶”。制茶是景迈山每位茶农的看家本领，是每个家庭世代传承的手艺。直至今日，景迈山茶农依然采用古法制茶，清晨去茶林采摘鲜叶，赶回家中将鲜叶置于竹席上，经过数小时的萎凋后，再用柴火铁锅进行炒青，使得茶本身的芳香物质得以很好地挥发出来。茶叶摊凉之后，就可以进行揉捻，揉捻不仅有利于茶多酚等物质的析出，也有利于制成外形漂亮的条索。之后就是将经过加工的鲜叶进行晒青，这是普洱茶制作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此工序也是“晒青毛茶”这个名称的来源。经过这几道工序制成的是初制茶，还需要进行筛选、拼配、蒸压、包装等精制工序。景迈山地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国家标准规定的保护区域内，茶农按照该标准规定生产制成的普洱茶，就可以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

景迈山的古茶林面积共有约 1120 公顷，促使茶农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进而形成“万亩古茶林”，正是一定规模的茶叶贸易。景迈山因茶马古道与外界发生联系，向外联通的道路不仅带动了茶叶贸易，促进了茶林的开辟和管理，还给景迈山带来文化技艺和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等。中国茶叶通过各种商道源源不断地运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各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茶文化。

千百年来，在景迈山，每一棵茶树，都取自大自然无私的馈赠；每一片茶叶，都源自茶农的辛劳。景迈山成为中国第五十七处世界遗产，景迈山和普洱茶更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茶文化的一扇窗口。景迈山的保护传承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对当今世界探讨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为清华同衡遗产中心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图①：景迈山上的嫩茶叶。

图②：景迈山茶林。

图③：被森林和茶园环绕的景迈山翁基村寨。

本文图片均为邹怡情提供  
版式设计：沈亦伶

晋南民间的一处碑楼建筑群

何沁学

山西运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2 处，在全国地级市中数量最多。位于闻喜县的“仇氏碑楼建筑群”就是一处值得细品的国保单位。

该建筑群位于郭家庄镇郭家庄村，在村口呈南北向分布，长约 130 米，共有 5 座碑楼、1 座牌坊、1 通石碑，为清同治、光绪年间所建。这些建筑均为石质材料，建于块垒砌的台基之上，遍布雕刻装饰。这些雕刻采用了阴刻、线刻、浮雕、镂雕、双面雕等不同手法，内容有龙凤、花卉、飞禽、瑞兽、人物等吉祥图案和颂扬主人的楹联、石匾、题额等，碑刻量大，工艺精湛，自成格局。尤其是其中两座奉旨所建的碑楼牌坊，景象威严，德行高彰，充满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仇氏一门自清乾隆年间就南下四川经商，延绵上百载，家底殷实，富甲一方。据记载，仇氏家族在当地多有善举，经常修桥铺路、赈灾济困，尤其在遭受流寇侵袭时，仇家子弟奋力抵御，保护村民，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

位于最北面的仇毓镜神道碑楼建于光绪九年（1883 年），坐东朝西，现高约 7 米，内立“覃恩奉政大夫、湖北黄州知府同知、岐亭清军水利司、乡饮正宾、秦宝仇公神道碑”，下有霸王相驮。这个碑楼是该建筑群所涉人物中，官职、辈分最高的一位，乃其重孙辈奉旨所建。碑楼前有一对石狮望柱，雕刻细腻传神。该碑楼建筑风格十分别致，为十字歇山顶，分为两层，一层为主碑，碑下兽头出栏，两

旁为八字巨幅石刻画屏，上有重檐歇山顶和花脊盘龙。画屏下有花边石墩，画屏四边有镂空花边连环图案，图案有高山流水、高台立凤、小桥流水、青松古屋等。人物有佩刀武士捧诏报喜，受禄者躬身接诏，还有童子扶老高杖者，孝男为长老捧食者，妇人携雏抱婴者，或坐或动，姿态各异。二层是四柱山顶，八梁相关，中间有一竖式匾额，格外庄严。额的上方有蝙蝠展翼，下有蜗牛卧底，四角卷龙镶边，左右饰有珍禽荷花梅花等图案。碑楼如此精美，足见清末石雕工艺水准之高。

仇氏三兄弟德行碑建于同治九年（1870 年），该碑坐东朝西，单檐歇山顶，石质仿木结构，建于石砌台基上。三座碑由北向南分别是：浩赠盐课司提举仇季公藏真德行碑、浩赠

黄州岐亭清军府仇长公静堂德行碑、例赠布政司理问仇仲公操高德行碑。额枋浮雕装饰图案，石柱镌刻楹联。

仇氏石牌坊及碑亭建筑群工艺精美，雕刻细腻，格调高雅，气势壮观。其中，仇毓镜神道碑与石牌坊在全国石质古建筑群中也堪称经典。随着岁月变迁和风雨侵蚀，几个碑亭都受到一定的破坏和损伤。2013 年 5 月，该建筑群被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又争取到国家资金予以修缮并加以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散落在晋南民间的碑楼、牌坊，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道德教化和家风传承的体现。

前不久，《东方故乡——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展览亮相国家博物馆。依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丰富馆藏，展览通过 220 余件（组）文物、解说详实的图片资料，再加上各类场景还原和多媒体技术手段，生动展现了从猿到人的数百万年活动历程，也全面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在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古 DNA 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成果。

刚进展厅，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就如磁石般牢牢吸住人们的目光。关于人类起源进化的展览，为什么会有恐龙？一方面为了引起更多观众尤其是孩子们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拓展览的深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本次展览策展人邓涛介绍，展览的第一单元相当于“人类前传”，有了这部分内容，才能完整呈现古脊椎动物“从鱼到人”的漫长进化之旅。恐龙，正是进化旅途上的一条岔路，丰富了旅途的风景。

对猿猴揖别的实证追溯，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19 世纪以降，在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广泛影响下，南方古猿、能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远古人类在世界各地被陆续发现，探寻古人发展演化的序幕从此揭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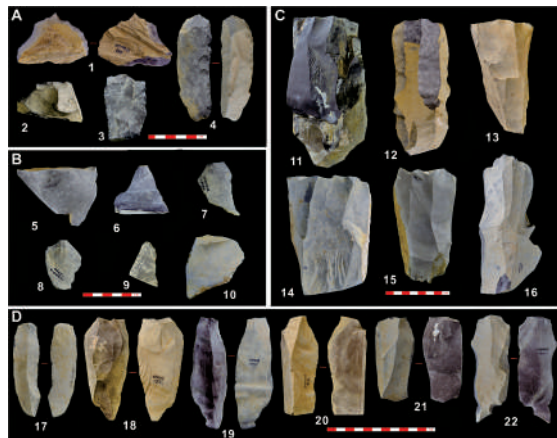
诸多展品中，有一块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下颌骨模型，它来自世界上最早的类人猿——曙猿。曙，意思是“黎明前的曙光”，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在人类起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最早的类人猿约 4500 万年前出现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古人类学家在江苏溧阳和山西运城都发现了曙猿遗存。“在约 3400 万年前，全球气温急剧下降，其他地区的类人猿大都灭绝了，只有迁徙到非洲这一支活了下来，逐渐进化，此后多次走出非洲，向全球扩散。可以说，灵长类尤其是类人猿是在东亚起源。”邓涛说。

寻找人类和灵长类化石殊为不易。相比其他哺乳动物，灵长类族群数量较少，且主要生活在森林中，在这一环境下，遗存很难形成化石。中国是世界上古人类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从 1929 年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骨化石起至今，我国境内已有 70 多处遗址发现了史前人类化石。分布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诸多古人类化石，连同大量伴生遗存，共同构成了人类演化发展的直接证据。泥河湾盆地人类遗存密集分布，其中逾百万年的遗址就有约 40 处，最古老的马圈沟遗址更接近 200 万年，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这些历程都在展览中通过代表性文物得以呈现。

制作工具曾被视作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展览陈设了出土自各遗址的大量石器。可以看到，这些石器的制造工艺始终停留在较为原始粗糙的阶段。当代东亚人中铲形门齿的比例较高。从展出的牙齿化石和模型可以看到，从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到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再到距今十几万年的晚期智人，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东亚人，铲形门齿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现象也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学说、“东亚现代本土起源”学说提供了支撑。

许多有趣的展品诉说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精神世界。发现于山东沂源、距今三四十万年的的一颗牙齿化石上，显示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剔牙行为，证明当时的人类吃到了很多肉食。一截距今约 4 万年的田园洞人趾骨，十分纤细，被学者认为是穿鞋造成的，这也是东亚人最早的穿鞋的证据。距今 3 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可以用自己磨制的骨针作为缝纫工具，佩戴由兽牙、细小的石珠、鱼骨、贝壳等钻孔后串成的装饰品；约 1.1 万年前，宁夏水洞沟的先民会为获取羽毛作为装饰品而捕获猛犸。“美”，成为古人生活的一种追求。

目前，越来越先进的科技手段尤其是古 DNA 技术的应用，让中国在人类史研究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在展览中也得到呈现。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古人群在万年以前已经分化，至少约 8300 年前起分化程度和遗传差异性开始减少，呈现出双向迁徙和交流融合。远古与现代、原始感与高科技在展厅奇妙交融，让参观者驻足沉思。



▲展览展出的西藏尼阿底出土石器。张凌凌供图

走近人类起源的「东方故乡」

周飞亚